

## 知青更不信任社会吗？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梁平汉 李佳珈<sup>1</sup>

历史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社会与经济的？这一问题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对于历史事件影响的可能渠道众说纷纭，许多研究者强调历史事件通过影响和塑造参与者的观念和态度，从而对未来发生持续影响。有研究表明：非洲黑奴贸易通过损害族群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今天非洲持续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 Nunn (2008), Nunn 和 Wantchekon (2011)；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是和中世纪的排犹历史相联系的 (Volgtlander 和 Voth, 2012)；原东德的价值观念至今仍然深刻影响到当地人民的社会和政治观念 (Alesina 和 Fuchs-Schuendeln, 2007) 等。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历史背景下，知青经历是否影响到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这场运动对经历者的社会观念是否具有长期影响？我们使用“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6) 数据，试图实证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何影响当事人的社会观念和信任态度 (Liang and Li, 2013)。从 1955 年到 1980 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项重大事件，涉及人数几达 2000 万人。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这个群体带来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后果。已有很多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文献关注这场运动的后果和对于知青个体的日后生活的长期影响，如人力资本损失 (Deng 和 Treiman, 1997; Zhang et al., 2007; Li et al., 2010)、就业状况和生活幸福感 (Zhou 和 Hou, 1999)、群体归属感 (Yang, 2003; 潘鸣啸, 2009) 等。

上山下乡经历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个人社会信任水平。首先，知青下乡过程中或者由于受到强制政策影响，或者由于丧失继续接受教育机会，损失了青春年华，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强烈的“受害者”心态，对社会整体和政府政策缺乏信任。其次，在运动过程中，知青来到不熟悉的艰苦环境从事繁重劳动，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由于“文革”中法制被践踏，知青的人身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不少人受到迫害；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知青和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冲突。这些都可能加重其“受害者”心态，导致其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不信任。同时，知青通过亲身接触和体会到“极左”口号和现实社会的巨大差距，意识到“走后门”、“血统论”等不公平现象的广泛存在，上进心湮没，会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对不公正现象的麻木 (刘小萌, 1994)。

然而，上山下乡运动也可能通过一些渠道对个体的信任和道德观念产生正面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上山下乡运动集中和强制地使中学生接触到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实，促使他们反思并理解同情中国农民，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更现实和成熟。知青下乡期间往往和其他知青共同居住和劳动，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感情得到加深，也更加信任彼此。回城之后，基于种种原因，这些知青相互之间相互联系，

---

<sup>1</sup> 梁平汉获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电子信箱：liangph@swufe.edu.cn。李佳珈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博士生；电子信箱：jjia\_li108@hotmail.com。

共同的上山下乡经历为相互之间的信任形成了深厚的基础（徐友渔，1999）。因此，“下过乡”成为社会上流传的“四大铁”关系之一。这些都可能加强知青个体的社会信任程度。这些正反面的影响相互叠加，如何评价上山下乡经历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因此就是一个重要实证问题。

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5个县（区）中的4万多个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这项调查涉及教育、就业、婚姻与家庭、心理与健康、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农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等七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该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在不同社会热点问题上的信任程度，从“最不信任”到“最信任”分为5档；涉及房价、股市、腐败问题、治安形势、矿难死亡等8类话题；信息渠道包括政府机构、中央级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等5类。由于这些针对同一个受访者的问题高度相关，将它们逐个分析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sup>2</sup> 经过一系列检验，结果表明只需要一个主成分便能解释大部分变量，因此，我们将以该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sup>3</sup>

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汇总提取了受访者对于不同社会机构和整体社会信任程度。表1是2006年调查中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表。在控制个人收入、教育、家庭等特征变量及加入省份虚拟变量后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知青的整体社会信任程度更低。然而，知青是一项持续20多年的运动，不同时代的下乡经历是否影响社会信任呢？如果按照“文革”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三段考察，我们发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更低，然而“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下乡的知青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1968—1970年下乡的知青（即“老三届”知青）的社会信任水平较其他阶段知青显著更低。

表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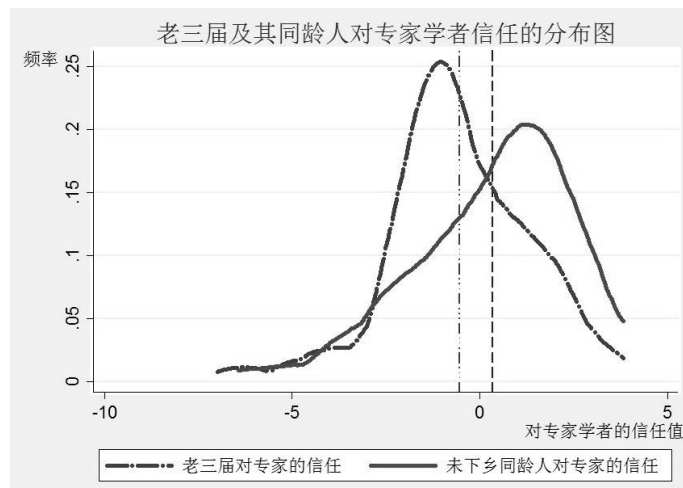
观测样本数	1357
受访知青数	215
“老三届”及其同龄人样本数	179
“文革”期间下乡样本数	165
“老三届”样本数	83
“文革”之前下乡样本数	23
“文革”之后下乡样本数	24

<sup>2</sup> 主成分分析法 (PCA) 是 Hotelling (1933) 首先提出的，它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较少的综合指标。转化生产的综合指标即称为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分都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

<sup>3</sup> 为了确保信任评分变量可以用到主成分分析法，我们还要将其逐个变量代入回归式考察其主要变量符号及显著情况的一致性，并以此作为运用 PCA 的前提条件；另外我们进行了 KMO 和 SMC 的相关指标测试，进一步证实了同一渠道的不同问题之前高度共线性的猜想。

那么，“老三届”知青是对社会整体不信任呢，还是对于某些特定社会机构不信任呢？我们分项考察知青经历对于不同信任对象的信任水平影响。我们发现，“文革”中下乡经历，特别是“老三届”经历，导致了对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显著缺乏信任，而并没有减低对于政府机构、新闻媒体、法律机构等其他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特别是在将“老三届”知青与其同龄未下乡的人相比，前者对专家与学者的不信任在1%的显著水平下低于后者。<sup>4</sup> 我们能从图1的信任分布图中看出明显区别。因此，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主要是“老三届”对于专家学者缺乏信任引起了知青经历导致更低的社会信任水平这一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上山下乡和“文革”初期的经历共同作用，对针对专家学者的信任程度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我们还发现，“老三届”知青对于专家学者显著缺乏信任这一现象并没有因为受访者后来的职业、社会地位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等生命经历而发生变化。

图1 老三届及其同龄人对专家学者信任的分布



图释：由主成分提取的“信任因子”中，观测到“老三届”及其同龄人对专家学者信任等级的评分的结果如下：(1) 未下乡同龄人对专家的信任评分的均值大于零，显然高于“老三届”对专家的信任评分的负均值；(2) 从整体分布来比较两个群体对专家信任的评分差异，未下乡的人群对专家的信任评分平均来看，显然高于“老三届”群体。

我们很难用文化教育外部影响这一传统观点来解释这一持续的低信任现象，因为，如果是“文革”或者极左教育思想的影响，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下乡的“老三届”或者“文革”后期的下乡知青没有显著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因为他们也在未成年阶段受到了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极左教育思想影响。如果仅仅是“知青”这一经历的影响的话，一来我们无法说明为何其他历史阶段的下乡知青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不信任，二来没有任何合理的理论依据说明为何知青应该更不信任相关领域专

---

<sup>4</sup> 通过文献，我们仅选择1948至1952年出生、且18岁时父亲为非农户口的受访者构成“老三届”及其同龄人样本。

家，而非其它可能更应为其苦难生活负责的社会机构。我们结合文献中描述的“老三届”自身特点，试图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不协调”理论，从个体主观行为角度出发，把他们的红卫兵经历和社会态度结合起来，从而为“老三届”独有的低信任现象提出了一种解释。

心理学研究揭示出“认知不协调”现象(cognitive dissonance)，即个人态度和行为中所产生的不相容的知觉，人们可能会因此去改变态度，以使认知间相冲突的程度降到最低(Benabou 和 Tirole, 2002; 2004; 2006a, b)。既然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是“老三届”知青的独有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他们自身的独有经历着眼寻找原因。“老三届”知青身上批斗知识分子的“红卫兵”这一“迫害者”经历和作为知青的“受害者”两种经历并存，存在两种身份认知的矛盾和冲突。当他们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形成“青春无悔”的态度时，他们就不得不压抑自己“迫害者”这一认知，不自觉地为自己的过去经历寻找理由和借口。刘慈欣(2008)创作的畅销科幻小说《三体》里描写的“文革”之后面对受害者的子女(主人公叶文洁)而毫无悔意的红卫兵正是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写照。许子东(2000)通过分析知青文学指出，曾经的“红卫兵”们通过坚持“大家都是被煽动的，都有错”、“我或许错了，但是我已经付出了代价”等观念，拒绝认真反思这段经历。“我或许错了，但决不忏悔”成为“老三届”知青这代人面对过去的一种重要观念。因此，通过把这些曾经受迫害的群体看作是不受信任的对象，他们减轻了自己作为“迫害者”的负罪感，进而减低这些认知间的冲突，获得自身认知间的平衡。青春无悔，不仅是“老三届”知青对过去自身经历的态度与观念，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于自己另一端不堪回首的经历的看法，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于当年自己手下的“受害者”的态度与信任。

#### 参考文献:

Alesina, Alberto and Nicola Fuchs-Schuendeln, 2007, Good bye Lenin (or not?)—the effect of communism on people's pre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1507-1528.

Be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2002, Self confidence and personal moti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871-915.

Be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2004, Willpower and personal ru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848-886.

Be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2006a, Incentive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1652-1678.

Benabou, Roland and Jean Tirole, 2006b,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 699-746.

Deng, Zhong and Donald Treiman, 1997,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391-428.

Hotelling, Harold, 1933, Analysis of a complex of statistical variables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4, 498-520.

Li, Hongbin, Mark Rosenzweig, and Junsen Zhang, 2010, Altruism, favoritism, 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down mov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8, 1-38.

Liang, Pinghan and Li Jijia, 2013, Persistent anti-intellectual views among old sent-down youth—a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orking Pap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unn, Nathan, 2008, The long 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 139-176.

Nunn, Nathan and Leonard Wantchekon, 2011,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3221-3252.

Volgtlander, Nico and Hans-Joachim Voth, 2012,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 1339-1392.

Yang, Guobin, 2003,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29, 267-296.

Zhang, Junsen, Pak-Wai Liu, and Linda Yung, 200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China: estimates based on twi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 631-639.

Zhou, Xueguang and Liren Hou,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2-36.

刘慈欣， 2008，《三体》，重庆出版社。

刘小萌， 1998，《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潘鸣啸， 2009，《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中译本，欧阳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许子东， 2000，《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 50 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

徐友渔， 1999，《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